



鲤鱼洲 纪事

(修订本)

陈平原
主编

故事本身很简单
精彩且有力量的
在细节 也在心情

北

大

记

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鲤鱼洲纪事

(修订本)

陈平原 主编

一
北
大
记
忆
一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鲤鱼洲纪事 / 陈平原主编. — 修订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
(北大记忆)

ISBN 978-7-301-29229-7

I. ①鲤… II. ①陈…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6898 号

书 名	鲤鱼洲纪事(修订本)
	LIYUZHOU JISHI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主编
责任编辑	于铁红 周彬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229-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00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回首烟波浩渺处

——《鲤鱼洲纪事》前言

陈平原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乃目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面对此古称彭蠡、彭泽、彭湖的大湖，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唐代诗人王勃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滕王阁序》），也不是宋代诗人苏轼的“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而是让四千北大、清华教职工“梦牵魂绕”的鲤鱼洲。^①

据北京大学《教育革命通讯》第3期报道：“我校近两千名教职员工家属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准备打仗’和‘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沿着‘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于（1969年）十月底奔赴教育革命第一线——江西北大试验农场。”^②从1969年7月10日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县鲤鱼洲筹建农场，到1971年8月16日“从江西分校返回的教

^① 为撰此文，查阅网上资料，方才注意到，老北大人挂在嘴边的鲤鱼洲，原来也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在地。1970年前后，数千上海及南昌的知青来到这里，默默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也隐约透露出，“五七干校”与“知青下乡”，二者确实是“难兄难弟”。

^② 《简讯》，《教育革命通讯》第3期，1969年11月21日。

职工 357 人于 14 日和 16 日分批到京”^①，大约两年时间里，鲤鱼洲成了北大教职员的主要栖居地。

因系汇集赣江、修水、鄱江、信江、抚河等水系经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水位升降幅度很大，“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这就给特定年代迷信“人定胜天”的人们提供了舞台。于是，“五七战士”奉命在此荒滩上战天斗地，围湖造田。当年所造的“万亩良田”^②，如今为了恢复自然生态环境，大都成为碧波荡漾的鄱阳湖区的一部分；这就好像历史，“主角”早已沉入“湖底”，你只能远远地眺望、沉思、驰想，再也无法重睹旧颜容了。

一、北大的“五七干校”

北京大学的官修“正史”，目前只有前半部^③；至于后半部，只能参阅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此书上下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发行内部版，2008 年推出修订本。涉及“鲤鱼洲”故事时，或称“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或称“北京大学江西分校”。编者是查过档案的，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认定，与其这么遮遮掩掩，还不如直截了当地承认：这就是北大的“五七干校”。因为，只有将此举放置在当初的“干校”潮中，才能理解众多蹊跷之处。实际上，当初下放鲤鱼洲的北大教师，平日里自称“五七战士”，而“农场”为解决子女入学而创办的学校，也叫“五七中学”“五七小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70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开

①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681 页、708 页。

② 这当然只是“大概而言”。北大离开时移交给江西省国营南昌市鲤鱼洲第二农场的耕地是 7415.14 亩，再加上清华移交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很大一部分，日后“退耕还湖”，至于具体数目，没有统计。

③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年/1988 年。

篇就是：“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在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可见，离开了“文革”中“五七干校”的兴衰起伏，无法谈清楚北大、清华的鲤鱼洲。

故事的肇端，虽有1966年“五七指示”的伏笔，^①但真正得以展开，却是在1968年下半年。各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于是希望通过知青下乡与干部下放，^②逐步恢复秩序，稳定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理念。具体说来，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称：“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战线等响应号召，纷纷在农村创建“五七干校”。如中宣部的“五七干校”在宁夏贺兰县，中共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在河南西华县，全国政协机关的“五七干校”在湖北沙洋，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南茶陵，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明港，北京师范大学的“五七干校”在山西临汾，中国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在河南信阳罗山，文化

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信，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封信后来称为“五七指示”。

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转发了《甘肃日报》上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编者按中公布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展开。

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畔……最后两个干校特别有名，这与杨绛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广受赞誉，以及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引起争议大有关系。

若没有当事人的追怀以及后人的记载，这些散布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早就被世人遗忘了。以北大为例，后人很难想象，被送到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的，竟然有66岁的心理学家周先庚（1903—1996）和语言学家岑麒祥（1903—1989），62岁的史学家邓广铭（1907—1998）和史学家商鸿逵（1907—1983），61岁的法学家芮沐（1908—2011），60岁的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59岁的逻辑学家王宪钧（1910—1993），58岁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11— ）（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去世——编注）等。事过多年，这些曾经的“五七战士”，或撰文，或口述，或借由友人的描写，呈现出鲤鱼洲的日常生活。

先看张岱年《曲折的道路》：

名单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装随着队伍乘火车前往江西。到鲤鱼洲之后，哲学系与历史系共组成第八连。住大草棚。初到鲤鱼洲，参加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修水坝等劳动。因年过六十，遂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同组还有王宪钧、周先庚、桑灿南、吴天敏、李长林等。鲤鱼洲土地是红土，有雨是泥，无雨如铜，泥地很滑，我经常摔跤，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八连常让老年人值夜班，夜间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经常值夜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一片宁静，颇饶静观之趣。仰望天空，星云皎然。^①

接下来是侯仁之的口述：

① 张岱年：《曲折的道路》，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484—485页。

特别艰苦啊！最苦的活儿让我干。我记得很清楚。就穿一个裤衩，拿块破布垫在肩上，背那个大水泥袋，压在身上。水泥一口袋很重啊！从湖里的船上背到岸上。河滩地，下来都是泥，扛着水泥袋走那个跳板，一颤一颤的，得特别当心。走一段路以后，还要爬四十四个台阶。……都是罚我。我那时已经快六十岁了，照常干。^①

至于两位历史系教授，没有留下直接资料，好在有学生或子女的描述。请看张广达笔下的邓广铭：

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北大数千教职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路”。干校实行军事编制，由军、工宣队领导。邓师和我被编入八连的后勤排，邓师放鸭子，我在蔬菜班种菜，师生情谊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脚，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像他这样的老教授在全干校也没有几个，可是邓师秉持素有的开朗乐观，能吃能睡，不改本色。^②

商传、商全在《学者之路》中，是这样谈论父亲商鸿逵的：

1969年，父亲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史学家成了放牛翁。每当水牛吃草嬉戏时，父亲便坐下

① 引自陈光中：《侯仁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96页。与此相对应的，是《晚清集》自序（侯仁之：《晚清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中的一段话：“‘文革’甫来，即受冲击，肉体摧残，精神折磨，江西鲤鱼洲，挑砖、打柴、插秧、割稻……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身心更加坚强。”

② 张广达：《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204—205页。

来，望着眼前茫茫的水乡田舍，有时写下几首记景抒情的古诗。这里虽然脱离了校园中那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但也离开了书屋，离开了讲台，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这田野间消溶、耗逝。^①

因需要充当大批判的“活靶子”，侥幸留在北京的季羨林，在《牛棚杂忆》第十八章“半解放”中，也有一段谈及鲤鱼洲：

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我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准备发配到鄱阳湖去。^②

这段话除了提醒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环境特别恶劣的鲤鱼洲，是有意对知识分子进行“热处理”；还有就是，1969年的北大师生，其实有好几种去向。

查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69年10月20日的大会上，宣传队及校革委会宣布：“师生员工分赴江西、陕西汉中和北京远郊区，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大道，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具体如何分配，见当年《战备、教育革命情况》第八期的记载：去江西鲤鱼洲的2037人，全部是教职工及家属；去陕西汉中的1247人，其中教职员工440人，学生807人；去北京远郊区农村的3493人；留校人员1569人中，老弱病残416人、

① 商传、商全：《学者之路》，《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417页。

② 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94页。

后勤及办事人员 997 人，在校筹建工厂 76 人，其他 80 人。^① 包含中文系在内的文科教员，大都去了鲤鱼洲，但也有因老弱病残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新北大”的基本力量而留下来的。

二、为何告别鲤鱼洲

既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镇”，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生活条件大都窘困。但是，像北大、清华鲤鱼洲农场那么艰苦的，确实不多。比如：全国政协机关的“五七干校”虽然原先是劳改农场，但为了办干校，当局将劳改犯合并他处，腾出一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的好地方；中共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是离黄泛区农场场部不远的“大跃进”时办起来的“红专大学”旧校舍，有砖木结构的瓦顶房，还有礼堂、篮球场等；山西临汾原本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的分校，建在这里的“五七干校”自然是有房有田有菜园。^② 中宣部的“五七干校”设在宁夏贺兰县立岗镇外，原本也是劳改农场，条件却比鲤鱼洲好多了——龚育之在《干校探亲琐记》中提及妻子孙小礼被分到了鲤鱼洲：“在江西鲤鱼洲办干校，可比我们在宁夏办干校艰苦多了。地点是鄱阳湖边的荒洲，住房要自己盖，几十人住一间草棚、两条长铺，十天才有半天休整，劳动强度大，双抢（抢种抢收）时尤甚。”^③ 到底是偶然因素，还是有关部门对北大、清华教师格外“关照”，给予特殊待遇？作为过来人，严绍璁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农场，

①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685 页、686 页。

② 参见汪东林：《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岁月》、金春明：《西华干校一千五百天》、何兹全：《在临汾干校劳动》，唐筱菊主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年，235—248 页、195—210 页、185—194 页。

③ 龚育之：《干校探亲琐记》，唐筱菊主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98 页。

有关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农场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有关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①

如此“刻意虐待知识分子”，只是口耳相传，未见诸专门文件或档案，但从日后北大、清华的匆促撤离看，此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除了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此地更是出名的血吸虫病高发区。这不是事后才知道的，之所以被农民遗弃，就是其不适合于居住乃至耕作——围湖造田而成的滩涂，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明知此中危险，奈何“军令如山”，只好就此安营扎寨。众多博学多识的“臭老九”，虽然也做了若干自我防护，但基本上无济于事。不到两年时间，危机全面爆发，最终促成了北大、清华的迅速撤离。

全国范围的“五七干校”，在“九一三”林彪事件（1971年）发生后，陆续有所调整乃至关停。但“极左”思潮并没有得到真正抑制，“五七道路”依旧光芒万丈。1976年5月7日，在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十周年之际，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第一枚“认真读书”，第二枚“生产劳动”，第三枚“插队锻炼”。一直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才真正进入历史。相对来说，北大、清华的撤退是最早的。1971年8月6日，也就是说在林彪出逃之前，北大已开始布置撤离鲤鱼洲了。此后就是请示江西省委，要求运回自己生产的粮食25万斤，木材500立方，钢材80吨，以及与江西省国营南昌市鲤鱼洲第二农场签署《基建资产移交清单汇总书》等。所有移交工作完成，已经是第二年5月了；在这

^① 严绍璽口述，石岩、张丽红记录：《严绍璽治学记》，《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个意义上,说办场共34个月也没错^①。只是对于绝大部分北大教师来说,鲤鱼洲生活只有两年。

与其他“五七干校”的转型不一样,北大、清华的撤退与林彪事件无关。那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一是大学招生,二是血吸虫病。民间有两个传说,很动人。第一种说法:有在鲤鱼洲劳动的北大教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把自己永久留下来,不要再轮换第二批教职工了,以免大家都成为血吸虫病的受害者。另一说则是北大清华汇报招生工作,称教师不够,一追问,主力都在鲤鱼洲。给我讲述此事的教授绘声绘色地说:周总理听到这个信息,突然无语,十几秒钟后,毫无商量地说:“那不是中国最严重的血吸虫疫区吗!把他们全部叫回来!在北京招生!”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周总理关于北大、清华撤离鲤鱼洲的具体指示,但《北京大学纪事》录存几则材料,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1971年6月10日,北大江西分校革委会提交《关于血吸虫防治情况的报告》,称,“分校地处疫区,尽管积极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抽查358人,患上血吸虫病的150人,占已查人数的41.9%。另一个统计数字更可怕:清华、北大两校江西德安化肥厂《血吸虫普查情况汇报》称,北大教职工129人,查出有血吸虫病的115人,占89%。因此,7月20日,北大校党委会讨论决定,撤销江西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至于撤退,当初提出的理由是:教育革命深入发展,招收学生增多,人员紧张;路途遥远,花费物力财力太大;当地血吸虫情况原来调查研究不够^②。

从鲤鱼洲撤退,等于取消了北大的“五七干校”,此举事关重大,肯定是得到了上级的指令或默许。否则,单靠北大校党委,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等勇气。至于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何人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没有进一步资料披露之前,只好暂付阙如。

^①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708页、719页。

^② 同上书,705页、707页。

三、当事人如何追忆

艰苦的生活环境与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只是“五七干校”的“表”；至于“里”，依旧是清理阶级队伍、挖出“五一六”分子、批判资产阶级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干校里的政治学习逐渐松弛，以致日后追忆起来，更多强调前一个侧面。钱锺书为杨绛的《干校六记》撰写“小引”，特别强调这一点：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虐疾病始终缠住身体。^①

以“批判斗争”为主线，各地“五七干校”几乎无一例外——起码主观上如此。因此，就像钱先生提醒的，讲“小点缀”时，不要忘了“大背景”；这“大背景”就是十年“文革”的思想路线与政治氛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向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文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北大内部呢？“从6月初开始，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推搡、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接下来是北大“校革会”成立，各种批斗会如火如荼。1967年起，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燕园里大打派仗，硝烟弥漫。1968年5月16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218名”。与“牛棚”同样让人触目

^① 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干校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惊心的，是不堪受辱者的“自杀”。1968年12月12日，“宣传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级队伍以来，北大自杀了17人。’”^①这17人中，应该有历史系副主任、三级教授汪篪、西语系二级教授俞大纲、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哲学系三级教授沈乃璋、中文系62级学生沈达力、生物系二级教授陈同度、物理系一级教授饶毓泰、数学力学系三级教授董铁宝等（按时间顺序排列），但不包括六天后（12月18日）服安眠药自杀的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及其夫人。如果算上劳改中不准治病或喝污水中毒而死的历史系二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西语系四级教授吴兴华，以及1975年上吊的图书馆学系二级教授王重民，北大“文革”中惨死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

这就是北大鲤鱼洲农场的“前史”。对于备受凌辱的“牛鬼蛇神”来说，下放劳动或许是“避难所”——那里毕竟以体力活为主，监管相对放松。可是，“五七干校”里，大批判依旧如火如荼^②。查《北京大学纪事》，1970年8月：“在江西试验农场召开第六次落实政策大会，共处理43人。其中被定为叛徒4人，特务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1人，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4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现行反革命4人，地、富2人。另给5名右派分子摘帽。对上述43人的处理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从宽处理者9人；从宽处理、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者2人；从宽、不戴帽子者21人；按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处理者4人；解除群众监督2人。”同年9月8日江西分校党委组织部统计：“农场现有教职员工1996人，其中，专政对象18人，从宽处理交群众监督者7人，‘历史不清正审查中的’114人，留校改造的学生18人，第六次落实政策受到处理的39人。”^③虽说在不断“落实政策”，不少人被“从宽处理”（“从宽处理”也是“处理”），可“审查”依旧在继续，思想改造未有竟期。

①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645页、671页、676页。

② 参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抓紧革命大批判》，《教育革命通讯》第4期，1969年11月28日；《简讯》，《内部通讯》第127期，1970年12月3日。

③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694页、695页。

即便不是批斗对象，置身其中，也是极为压抑。对于曾经生活在鲤鱼洲的北大教职工来说，那是一段痛苦的、难以磨灭的记忆。有意思的是，一旦撰文，当初的辛酸、悲苦与怨恨，大都点到为止；正面描写的，主要是温馨的友情。除了日常生活中同事间互相扶持的点点滴滴，很多文章都提及了张雪森之死。1970年12月5日，中文系师生41人乘车到井冈山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清华江西农场机务连附近大堤翻车，教师张雪森、学员王永干当场被压死，另有5人受伤。此事当初之所以引起很大震撼，除了“五七战士”间的友情，恐怕也包含了“兔死狐悲”的意味——很多人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以及那十分渺茫的前程。

与其他“五七干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北大人还在鲤鱼洲办学。1970年9月，418名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进入鲤鱼洲的“北京大学江西分校”学习。这所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赓续的不是老北大的传统，而是“向‘共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走‘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道路”^①。这就难怪，1970年7月，北大江西分校提出一份（招生）专业介绍，其中，中文系的课程这样设计：“（1）毛泽东文艺思想，（2）毛主席诗词，（3）革命样板戏，（4）文艺创作，（5）文艺评论（训练在文艺战线兴无灭资斗争、批判封资修文艺和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能力）。”好在学员们一半时间在田里劳动，没必要上那么多课（参见乐黛云、段宝林、陆俭明三文）。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怨不得具体的老师或学生。看看《北京大学（1971—1975）五年规划纲要》，号称“要在五年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以文科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其办学方针竟然是：“文科要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外语教材要‘七分政治三分文学’，适应国际阶级斗争需要；理科教材要不断总结我国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批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②本校尚且如此，鲤鱼洲的教员及

^① 《向“共大”学习，走“抗大”道路》，《内部通讯》第105期，1970年9月27日。

^② 参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693—694页、695页。

学生更是无所适从。

对于后人来说，如何理解这一段荒谬的历史以及当事人的困惑与挣扎，完全可以有不同角度。我关注的是，北大的“五七战士”身处逆境，精神上却没有被彻底压垮，甚至颇能自娱自乐。周先慎、杨必胜、袁良骏等文谈及鲤鱼洲流行“天佑体”——“水田里干活时候的集体吟诗”、“这诗随口喊出，或一人喊一首，或有人先喊一句，其他人一人接着喊一句”、“说白了即是即兴诗，或曰顺口溜”。有过类似生活经历的人，很容易接受这种服务于劳动生产的“田头诗”^①；也只有还原到当初的语境，才能理解当事人为何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②。

真正为干校认真写诗、公开出版且引起争论的，是曾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生活三年的臧克家。诗集《忆向阳》1978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推出，在序言中，臧克家自称：“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诗集出版不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潮流为之一变。于是，有了姚雪垠致臧克家的“公开信”：

你的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几十首诗是在“四人帮”最猖狂的1975年写的。你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出于揣摩所谓“中央精神”，精心推敲，将干校生活写成了“世外桃源”、“极乐世界”。从诗里边只看到了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却看不见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看不见封建法西斯主义利用“五七”干校等形式对革命老干部和各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打击、迫害和摧残，也看不见革命老干部和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除劳动愉快外还有内心痛苦、惶惑、忧虑、愤慨、

① 据周先慎《草棚大学纪事》：“当时来得最快的是沈天佑同志，真可以称得上出口成章，他的诗不加修饰，不加锤炼，甚至也不讲究押韵，只要凑上四句，喊出热情和干劲就行。后来大家就把这种在劳动中产生的，不大讲究技巧，只重鼓舞作用的田头诗歌称作‘天佑体’。”

② 这么多人追怀“天佑体”，称道其在鲤鱼洲如何风行，可我目前见到的，只有胡双宝文中引的这首诗：“七连有个胡双宝，光吃馒头不吃草，平整土地缺水牛，拉起耢子田里跑。”

希望和等待。^①

姚的批评不无道理，只是如此“上纲上线”，让老诗人臧克家实在受不了。于是，臧给周扬等写信，自我辩解的同时，揭发姚此前如何多次大赞《忆向阳》，如今风向一变，翻脸不认人^②。

同样描摹干校生活，杨绛刊行于1981年的《干校六记》，却获得了文坛及民众的一致好评。此书收《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写的是干校的日常生活，文笔淡雅，语调平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既不同于“文革”期间阿谀奉承的“遵命文学”，也不同于以控诉为主调的“伤痕文学”，有委婉的讽刺，有淡淡的忧伤，但更多的是洞察世态人情的超然。关键是，作者对于刚刚过去的“文革”以及干校生活“自有主张”，故能写出自家以及夫婿的“真性情”。

即便如此，钱锺书在《〈干校六记〉小引》中，还是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钱先生看来，饱受政治运动折磨的中国人，不能只是《记屈》或《记愤》，还有责任《记愧》：或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或惭愧自己是懦怯鬼，或惭愧自己充当旗手、鼓手与打手。毫无疑问，最应该忏悔的是第三种人，可第三种人往往最沉得住气。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提及，之所以该书1992年写好，却要压到1998年才出版，就因为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期待那些当初以折磨人为乐的“造反派”忏悔，或把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写成文章。当然，无论是钱先生的呼吁，还是季先生的期待，最后都落了空。

反而是本无多大过失的普通人，还有饱经沧桑的受害者，在时过境迁后，还能冷静地思考这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一代人的困惑与苦难，

① 姚雪垠：《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上海文学》1979年1期。

②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参阅徐庆全：《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博览群书》2006年4期。